

女性主义的男性视域再阐释*

吴 芳

【摘 要】 女性主义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男性与女性主义间的吊诡，只有女性才能而且在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观点，不仅奇怪，而且在战略上很不合理。事实上，穆勒、西美尔、布迪厄等男性学者的女性主义思想对于女性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双性视域是女性主义发展的合理途径。

【关键词】 男性视域 女性主义 穆勒 西美尔 布迪厄 桑德拉·哈丁

【作 者】 吴芳，黄山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 (2020) 06-0185-10

女性主义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男性与女性主义间的吊诡，对于男性究竟能否成为女性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女性主义的研究者，是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众多的男性和女性理论家、批评家积极参与了这个问题的争论。这个话题也许是女性主义研究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女性主义作为极其特殊的一个理论流派，是众多理论流派中唯一会出现对研究者的性别进行甄别的派别，研究主体身份的问题，是进行女性主义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女性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男性介入女性主义领域的问题的探讨。如对于男性理论家伊格尔顿和卡勒进行的女性主义理论阐释和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认为可能是男性批评家的一种盗用女性主义批评而达到代言的策略，并质疑卡勒的“作为女人的阅读”理论，提出“男人能像女人一样阅读”的疑问。^{〔1〕}而部分女性主义者则戏称鲁斯文为“鳄鱼邓迪”，讥讽他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鳄鱼的眼泪”，他对女性的同情是假慈悲。但是女性主义者在质疑男性进入女性主义批评的同时，却又肯定了男性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如在肖沃尔特看来，作为男性批评家的卡勒的理论和观点不是“像妇女一样，而是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性主义者进行阅读”^{〔2〕}，虽然他从来没有自称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但他对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却进行了

* 本成果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1〕 Alice Jardine and Paul Smith, ed., *Men in Feminism*, Elaine Showalter, “*Critical Cross-Dressing: Male Feminists and Woman of the Year*”, Methuen: New York and London, 1987, p.116.

〔2〕 Alice Jardine and Paul Smith, ed., *Men in Feminism*, Elaine Showalter, “*Critical Cross-Dressing: Male Feminists and Woman of the Year*”, Methuen: New York and London, 1987, p.116.

女性主义的解释。肖沃尔特还肯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英文系教授尼尔·赫茨(Neil Hertz)、斯蒂芬·希斯(Stephen Heath)、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系教授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都是真正的男性女性主义者,尽管这样的男性学者凤毛麟角。^[3]斯皮瓦克则认为:“德里达是依仗于(理想化)女性的庇护方得以将自己与菲勒斯中心传统区别开来。”^[4]

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女性主义批评主体的尴尬处境。女性批评家面对男性的参与,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拒斥还是赞成,是关系到女性主义生存的重大问题。男性批评家进入女性主义批评,在面对部分女性批评家的强烈反对和猛烈抨击之时,究竟能否继续坦诚、冷静地做到可能的公正?男女研究主体在介入女性主义批评之时显现出了极其深刻的矛盾。

一方面女性主义反抗男性中心,强调男女平等,张扬女性特征,但过分强调女性特征,则有可能导致女性至上的另一种性别主义,反之则会重新陷入男性中心论;另一方面开放的女性主义应该允许男性参与进来,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也认为应该让男性作为学者、理论家、批评家进入女性主义批评领域,但是有可能导致女性主义批评非政治化的危险,^[5]而拒斥男性的女性主义则是封闭的女性主义。究竟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女性主义很难明确回答的问题。作为较为特殊的批评理论的女性主义批评,男性能否对它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与批评?男性能否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是否质疑与批评它的男性就不是女性主义者?这些都是女性主义批评无法避开的悖论。事实上,怀疑男性能否像女性那样进行阅读与写作,与否定女性能像男性一样阅读与写作同样是不合理的。必须承认,男性与反女性并不能划等号。片面强调女性经验而否定男性批评的可能的公正,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认为男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在人类历史上的两性世界中受压抑时间太久,直到19世纪以来经过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运动,十分不易地取得了一些权益,非常渴望巩固已经获得的胜利成果。这些女性主义者反对男性中心文化,进而从根本上怀疑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的诚意,怀疑男性参与女性主义批评可能的公正性,所以她们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都始终拒斥男性,反对男性学者进入女性主义批评。当男性给予女性帮助,参与女性主义研究时,她们具备了戒心,一时难以接受男性的诚意,比较偏激地认为男性会篡夺她们争取的权利,重新占据统治地位。

其实,一些著名的男性批评家和理论家着手于女性主义批评,其切入点正是女性主义长期“统治”着的性别意识,而这种性别意识正是男性的女性主义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他们要成为女性主义的研究者,必须回答下列问题:作为男性的阅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对父权制的怀疑还是屈服?男性从事女性主义研究是他们采取的“换装术”吗?他们会盗用、渗透或利用女性主义话语为男性服务吗?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对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已经在男性批评家和女性批评家之间的激烈论争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部分女性主义者的一个错误论断就是男性不可能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为这部分女性主义者一味强调其研究主题一定要来自女性自身的经验。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的确进入了女性主义领域,真正展开了女性主义的分析研究之时,这个令女性主义者困惑的问题则显得有悖

[3] 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4] G. C.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1987, p. 83.

[5] 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1页。

于女性主义的发展。首先,男性对于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有目共睹。

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mart Mill),作为男性学者参与女性运动的先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于1869年创作了著名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在这部男性为女权辩护的著作中,他从社会进步的需要角度出发,确认:“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个原则应代之以完全平等的原则,不承认一方享有权力或特权,也不承认另一方无资格。”^[6]主张从法律上维护妇女权益,赋予女性选举权和参政权,接纳女性“进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7]。穆勒与同时期的弗兰西丝·赖特(Frances Wright)、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苏珊·安东尼(Susan Anthony)、哈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等女性主义者并肩作战,为争取女性的权益摇旗呐喊。

穆勒对传统的习俗和偏见进行了批判,认为情感是最大的障碍,只有理性地分析旧制度和旧习惯,才能帮助女性赢得应有的权益。传统的女性全然从属于男性的制度“从来也不是深思熟虑或预先盘算的结果,不是任何社会观念或什么有助于人类的利益或社会良好秩序的意见的结果”^[8]。这种制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史前时期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尽管“体力最强者的规则”已经不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规则,但是这种超越并未根本改变女性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女性在婚姻中从精神到物质上对于男性的依赖,使家庭成为了女性受压迫的重要场所。因此穆勒批判了家庭,批判了家庭中最重要 的男女关系。他甚至认为女性的屈从地位之所以得以延续的原因在于,男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迫使女性屈从,“因为大多数男性尚不能容忍同一个平等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个观念”。^[9]这一观点带有激进女性主义的特点。

穆勒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巴巴拉等女性就是以穆勒提出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并从女性自身的体验出发,认为女性“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有思考的权力,每一种思想都打上自我的烙印,并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天赋,拒绝服从男性权力……自然教导我自由地实现对世界的责任”^[10],提出妇女应该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权益,尤其是选举权。与此同时,穆勒还与女性主义者一起于1865年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尽管请愿书被否决,但此次请愿的影响不可小觑,政府在1867年的改革法案中把“男人”一词换作了“人”。男性统治者的这一妥协,无疑激励了女性主义者,给予了他们极大的信心。此后,各种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目标的女性主义协会组织争相涌现,英国的女性主义运动正式走向成熟。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穆勒的女性主义思想本身具有矛盾性,他既强调男女平等,又把女性看成男性的配角来探讨女性的权利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整个父权制,不能真正解决妇女的屈从地位。但在19世纪以男权为中心的欧洲,作为一位男性,一位开先河者,穆勒能认识到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勇于冲破重重藩篱,先女性之忧而忧,为女性的真正解放而努力实践,实属难能可贵,具有开创性贡献。

[6]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5页。关于女权问题,他曾写过三部著作,即《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妇女的参政权》。

[7]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1页。

[8]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8页。

[9] 转引自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0] Patricia Hollis, *Women in Public: Documents the Victorian Women's Movement*,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79.

穆勒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为女性争取权益而大声疾呼的男性,或者可以说是第一位男性女性主义者。

德国社会学古典大师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则更加纯粹地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

他在阐述女性主义的“女性文化”论时表明,人类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没有性别的,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文化。不难肯定,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都是男性文化,男人创造的语言、艺术、法律、宗教、科学等等,具有男性特征,女性品质受到历史的压抑。但问题是女人“就自己是女人这一点对女人来说,比起自己是男人这一点来说,更具本质性”^[11]。男性追求的只是生命的载体,而不是生命的本体,是灵魂的功能,而不是灵魂本身,是存在的方式,而不是存在本身。因此女性品质比男性品质更好,更富有灵魂的财富。

西美尔在文化哲学的基础上,从女性精神与文化形式的关系角度反思了现代文化,探究了女性的第二性地位的真正原因,并提出了如何改变女性的屈从地位。他认为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深层原因是女性面临的文化困境。现有的占主导地位的主观文化具有男性特征,其价值标准也是男性的,这对评判女性极为不利。所谓传统的女性特征也是从有利于男性的角度出发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从男性的取向和意愿出发的,是取悦男性、为男性服务的,而不是从女性自身出发、满足女性的取向和要求的。当女性从事客观专业化的男性职业时,她们的力量表现受到阻碍,不是因为她们的力量太弱小,“而是因为她们表现力量的方式不适合现今的文化劳动范畴”,“女人最深邃的本质力量根本无法表达,从而夺走了女人身上的文化劳动的创造性”。^[12]用男性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规范来衡量女性时,女性特征则是弱小的、无力的,甚至一无是处的。因此西美尔指出,现存的把男性的文化看作唯一可能的文化的习惯,使女性面临着两难境地:“要么放弃创造性的文化成就,要么放弃自身”,这就要求女性“在保持自己特性和从事一种创造性文化成就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13]。

西美尔认为男女性别差异的感觉是不同的,男人的性别感只是一种行为,而女人则是身体本身,“女人生活在存在与女人存在最深刻的同一性中,生活在自在地规定的性别特性的绝对性中。这种性别特性,就其本质而言,不需要同异性的关系……这种绝对也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而是仿佛在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前,以实质的、静止的完整性承担着人的类特性的统一体”^[14]。这就要求历史性的男性文化必须有所改变,应该由女性来掌控文化的主导权。女性主义的实质并不是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所积极倡导的努力挖掘被埋没、被遗忘的女性文化作品那样,而是女性文化“形式的永恒意义”。具体、个别的女性作品只是个体、部分的,未必具有文化形式的持久特征。所以西美尔认为女性文化运动并非是要创造出女性化的艺术文化,而是要使文化的主体在品质上与一直以来的男性文化不同。女性主义的女性文化运动,争取女性成为文化的主体,这如同一种新的贵族统治诉求。所以,西美尔甚至认为女性运动要比工人运动的意义深刻得多。

西美尔对于男女性别差异的描述显然与歧视女性的卢梭等人大相径庭。尽管有学者认为西美尔无法理性地解答女性文化生产在男性文化生产中未来成长的问题,他的性别文化论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从形而上学层面否定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但作为一位男性,西美尔毫无保留地高度评

[11]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2]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13]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14]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价了女性，充分认可了女性的品质，并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则从理性高度给予了女性主义极大的支持。相比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他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观点无论是从理论的视角还是从理论的深度来说都毫不逊色。他的女性文化论可以看作引领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经典，与性别形而上学一起形成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巨大启示和影响。西美尔是继穆勒之后又一位坚定的男性女性主义者。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在重要著作《男性统治》中，他直接对男性统治提出了质疑，认为：“自从有男人和女人以来，男性统治就固定不变了。”^{〔15〕}

布迪厄从惯习和场域的概念出发，仔细分析了女性生活所包括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他认为，当代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社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成员都成为联系密切的网络中的一部分，其生存条件和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率先提出了“惯习”和“场域”的概念。所谓“惯习”，就是指个体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下生成的习性，惯习与客观条件密不可分，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具有自我生成功能。而所谓“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世界就是由这些相对独立、自主的一个个小空间构成的，这样的小空间就是场域。而场域和惯习的关系，则体现了社会与个体、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惯习在个体内生成社会实践，而场域则从外部规定着人类的行为规范。

由于场域决定着惯习，而女性生活在由男性主导的场域中，处于被动地位。现有的社会是父权制主导的社会，社会上一切不同的场域（包括女性场域）都被根深蒂固的“男性的场域”统治着，女性在这样的场域中寻求平等和自由是十分困难的。而女性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习惯，不是自然的生理因素的反映，而是由其所处的劣势社会地位决定的。布迪厄认为，要改变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现状，就要从女性的惯习出发，通过考察其所处的场域，寻找增强女性自身场域的方式，构建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场域，从而有效地对抗强大的男性场域，获得平等的话语权。

他指出，在男权中心体系下，社会的分配秩序依靠的是“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出的权力具备很强的隐蔽性：“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接受下来，无需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16〕}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暴力。这种披上所谓合法外衣的秩序和权力是由社会中的上层（包括性别关系中的男性）来界定的，社会中的广大下层（例如性别关系中的女性）实际上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但他们也都默认了这种暴力的合法性。这种暴力是被统治者控制的看不见的暴力，而被统治者服从了统治者的意识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这样做起来显得好像是自然而然的。

这种暴力被布迪厄称之为“象征暴力”，他说：“我也总是在男性统治及其得到承认和接受的方式中，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服从的典型例子，此种服从是我称之为象征的暴力……为此，应该对我们自身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采取人类学家的视角，这个人类学家既能赋予我们认识到的男女之间的差别原则以随意的、偶然的特征，又能同时赋予它社会—逻辑必要性。”^{〔17〕}象征暴力就是这样一种温和的暴力——男性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这种类似于催眠术的手法将男性统治的意识植入被统治的女性群体意识之中并使之内化，让女性自觉接受这种意识。“男性统治将女人视

〔15〕 布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5 页。

〔16〕 布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 2002 年版，正文第 8 页。

〔17〕 布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 2002 年版，序言第 2 页。

为其存在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的象征客体,它的作用是将女人置于一种永久的身体不安全状态,或更确切地说,一种永久的象征性依赖状态。”^{〔18〕}象征暴力使女人与男人一样参与了男性统治,可以说是被统治者推进了对自身的统治,女人按照男性的视角构筑生活和社会关系,贬低了自己,进而成为男性统治的同谋;她们与男性一起促成男性统治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统治。而使女性处于永久性的依赖之中,正是男性统治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

总之,在男权中心制社会里,象征暴力施加于女性身上,女性的内心实质上由男性意识所掌控,女性的自我经验由男性所言说,女性自身的特征由男性来界定。女性主义者有理由认为女性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从自身的真实经验出发,冲破男性中心意识对女性的控制,破除传统秩序强加给女性的象征暴力,发出女性真实的声音,体现出真正的女性的主体性。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的匮乏是女性处于劣势地位的另一个原因。“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而形成的劳动,具有一种生产利润的生成性。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这个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相对于男性群体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其社交的资源也体现出十分匮乏、范围狭小、对象单一的特征。他认为,社会资本占有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对权力场域的争夺。没有社会资本就没有发言权,女性群体因为其匮乏的社会资本的拥有量而失去了与男性群体竞争并求得平等的机会。

女性主义者在充分认同了布迪厄的理论——女性占有社会资本的不平等,正是阻碍女性获得平等权力并进行正常竞争的根源,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从而导致了男性社会主导的持久性之后,她们在女性主义理论及实践中极力主张获得自己的资本,从而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扩大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在就业和参政等方面获得公平竞争的可能。

布迪厄积极地评价了女性主义:“在反对一切统治形式的政治斗争中,女权主义注定占据一个原初的和公认的地位。”^{〔19〕}他坚信,揭露统治的不可见的暴力过程有利于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统治制度本身。男性统治并非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一种历史构造的产物。1998年8月28号的法国《世界报》刊发了波尔·德鲁瓦对《男性统治》的评论,他说,布迪厄“写了这本书之后,很可能只有在女性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朋友了,很显然,他希望女性主义者帮助他斗争”。^{〔20〕}

如上所述,穆勒、西美尔、布迪厄等男性学者的女性主义思想对于女性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19世纪中后期,西方文明史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产生了质的变化。男性学者开始了对于女性认识的转变:从一直以来的歧视到尊重、从贬抑到重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从来没有如这个时期那样被关注。这个时期因此也成为了女性命运的转折时期。在此期间,男性学者纷纷关注女性问题、关心女性地位和权益、强调男女平等,研究女性主义和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大有人在。除了穆勒等男性学者给予了女性和女性主义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拉曼·塞尔登、伊格尔顿、乔纳森·卡勒等男性学者也为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积极参与是女性主义得到理解和支持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有力保证,也是最终实现男女平等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很显然,对女性主义的贡献与性别无关,把性别作为贡献与否的判断标准,明显是不成立的。其次,由那些对于女性抱有肯定、理解态度的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研究,可以达到单一性别主体无法完成的研究结果。男性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开展的自我批判式的研究是女性批评家难以做到的,正是这种自我批判式批评对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第三,男性视域的引入,是对女性视域的补充,

〔18〕 布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正文第90页。

〔19〕 布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6页。

〔20〕 波尔·德鲁瓦:《悖论的文化》,载《世界报》1998年8月28日。

女性主义的研究由原来的单一的女性视域发展成男女两性的双性视域。男性视域可以弥补女性视域的不足，女性视域同样可以反观男性视域的缺陷。男女两种视域互为反观、互为补充，可以形成更为全面、更为完善和更具内在张力的女性主义研究。所以女性主义者一方面批判男性批评家忽视、不关心女性主义批评，另一方面又否定男性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意愿和能力，坚持认为男性不能、也不可能进入女性主义批评，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有的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女性主义是女性自己的事情，与男性无关。这其实是宣称只有女性才能而且在从事女性主义研究。这种观点不仅相当奇怪，而且在战略上也是很不合理的。^[21]

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 (Sandra Harding) 在《女性主义与方法论》的导言《没有一种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中指出应该防止“男性在女性主义研究和学术发展上不可能作出重要贡献”^[22]的错误推论。在男性参与女性主义的问题上，她申明了两个观点：其一，“当女性主义者批判男性研究者忽视女性和社会性别问题时，如果她们还坚持认为男性没有能力从事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研究，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二，“女性主义者经常坚持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女性的问题，所以如果女性主义者还坚持只有女性才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则实际上说明只有女性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这种观点不仅看起来奇怪，而且至少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23]

女性主义自19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迅猛而且持续。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主义研究在西方不是没落了，而是越来越兴盛，横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越来越多的男性学者参与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促进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英国著名教授拉曼·塞尔登 (Raman Selden)、彼得·威德森 (Peter Widdowson) 和彼得·布鲁克 (Peter Brooker) 联袂撰写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24]，对当代最显著、最具挑战性的文学理论流派作了梳理和展示。作为重要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不管版本如何更替，内容如何增删，女性主义理论总是著者关注的焦点。在修订的第四版，著者舍弃了历史较为长久的“神话批评”，但是女性主义批评仍作为进入了学术与文化的主流并对现成观念提出了有力挑战的理论继续保留。由于和“后理论”相比而言，女性主义也许产生时间较早，但是对于作为方法论和观念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性和意义的女性主义，著者尤其注重了它的编排。在每一版都有专章介绍女性主义的基础上，第四版还增加了与女性主义有传承关系的“同性恋理论和酷儿理论”的章节。在这本书的第六章“女性主义理论”，著者对女性主义作了全面的阐释和介绍，重点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女性主义批评初潮和二潮，评述了包括伍尔夫、波伏娃在内的重要女性主义批评家，并把第三潮的讨论融入了后面三章“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中，充分体现了女性主义在解构性别、民族、种族的复杂语境中，与后现代各种理论的互动。正因为“女作家与女读者从来是在‘与潮流对抗’中工作的”，“女性主义批评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表述，仍然致力于从自然而然的父权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中挣脱出来。……它意味着拒绝被纳入任何特定的‘方法’中，并力图打乱和颠覆一切既

[21] Sandra Harding,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6.

[22] Sandra Harding,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

[23] Sandra Harding,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6.

[24]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5版），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定的理论性实践”^[25]。因此著者更倾向于把女性主义批评看成是一种文化政治。可以这么说,著者不仅高度重视女性主义的阐释,同时对女性主义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同样由拉曼·塞尔登主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1988)^[26]的“阶级与性别”章节在总述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分别选编了弗吉尼亚·沃尔夫《自己的房间》(1929)、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1949)、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性小说家》(1977、1982),以及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1976)这些经典女性主义作品中的部分内容。

尽管以上的两本文学理论作品的体例不同,但都辟有专章介绍女性主义,由此可见拉曼·塞尔登对于女性主义的关注度非常之高。

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的《文学理论:实用性导读》(*Literary Theory: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27]提出性别视角包括女性主义、同性恋、雌雄同体以及跨性别的研究,并从性别研究视角分析了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King Lear*)、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诗作《自负的男人》(*Roosters*)等以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艾斯彭遗稿》(*The Aspern Papers*)等作品,重新诠释了这些经典文本。对经典的重新解读、赋予它们新的意义,是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视角的重要贡献。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格里高利(Gregory Castle)的《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8]介绍了包括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特里莎·德·劳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等十一位重要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尽管此著作中的介绍比较简略,但是从选编的批评家的数量比重来看,足见作者对女性主义的重视。

作为“理论批评的里程碑”的《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29]的主编、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认为文学理论变革的一种模式就是政治运动的结果,而女性主义是大规模政治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理论是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和颠覆,重新界定理论并建构新的理论。批判忽略了性别差异的传统理论,重新建构具有性别与文化差异的新理论,是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目标。该著作选编了凯瑟琳·斯廷普森的《伍尔夫的房间,我们的工程:建构女权主义批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镜与妖: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以及伊莱恩·肖沃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自治与同化》等论文,并把埃莱娜·西苏的《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作为开篇,因为对于西苏而言,“理论是个人及公众对于伦理和文学价值观的信奉”^[30]。科恩认为这些论文对社会和文学的分析不仅深奥,而且富于启发性。女性主义理论更多地是试图改变读者传统的思维方式,使读者能够用审视的眼光看待那些业已公认、却具排他性的理论和文本。也许这是女性主义为什么从兴起到当下能够持续兴盛并继续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本预示文学理论未来走向的集子,在十八篇论文中,女性主义论文就占有四篇,可见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理论界的分量。

由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和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尼古拉·罗

[25]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5版),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1页。

[26]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 Michael Ryan, *Literary Theory: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2nd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28] Gregory Castle, *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29] 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0] 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伊尔 (Nicholas Royle) 合著的文学理论教材《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31]，其中《性别差异》一章以“性别差异”为关键词阐释了女性主义理论，并用不同阶段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不同观点，分别阐释了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与托马斯·怀特的十四行诗《谁愿意出猎》(*Whoso List to Hunt*)。作者认为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解释文本比本质主义的角度更为复杂，而且性别差异不仅包括性别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包括同一性别之内的差异。性别差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文学文本的新维度，而解构的女性主义批评模式恰恰为解读文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理论空间。

兼顾了主题和理论流派的编选模式的、英国的菲利普·莱斯 (Philip Rice) 和帕特里夏·沃夫 (Patricia Waugh) 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32]，编选了六种文学理论流派的经典理论批评著述，女性主义与索绪尔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等一起构成了当代批评理论图景。

朱利安·沃尔夫雷 (Julian Wolfreys) 和威廉·贝克 (William Baker) 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Literary Theory: A Case Study in Critical Performance*)^[33]，则与前面强调理论性和体系性的著述不同，重在批评方法的运用，该著述收录了分别用包括女性主义批评等六种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女性主义批评作为重要的批评方法，在西方文学理论教材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通过对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勾勒出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得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其中女性主义是作者重点评述的内容之一。

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作为言简意赅的文学理论入门读本，在附录：理论学派与流派中也有女性主义的专门介绍。卡勒认为女性主义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三种理论模式之一，而且女性主义“在它众多的项目中通过拓宽文学的标准和引进一系列新的议题，已经给美国和英国的文学教育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34]。

作为当代德国文学理论的代表作，由康斯坦次大学编选的《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 (2001) 是比较系统地反映当代德国文论景观的一部著作。该著作收录了当代德语人文世界最著名的学者的 16 篇文章，对当代德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考察了当代德国文学界审视文本的种种视角，其中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文学视角是不可或缺的批评视角。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作为文论界一个无法避开的理论，男性学者的阐释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不可小觑。男性理论家的阐释展示了女性主义理论阶段性和系统性的基本形态，一方面表明了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女性主义在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前提，是使女性主义批评成为重要的批评模式的基础。可以这么认为，男性理论家阐释的经典性和权威性，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理论家在

[31]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王正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32] 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

[33] Julian Wolfreys and William Baker, *Literary Theory: A Case Study in Critical Performance*, London: Macmillan, 1996.

[34]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2 页。

理论介绍和阐释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女性更全面、更深入。

对于不带性别偏见的男性学者和女性主义的关系,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男性女性主义者(male feminist),顾名思义,身为男性,但坚持从女性的观点立场出发,积极为女性争取权益、争取男女平等,是彻底的女性主义者。哈丁曾明确表示“可以把‘女性主义者’这样的称号送给那些能达到女性要得到这个称号所需要达到的所有标准的男性”^[35],而且在与笔者的访谈中重申了支持男性女性主义者的观点^[36];一种是男性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这是指进入女性主义领域,从事女性主义研究、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述评的男性学者;第三种则是“拥女主义者”(pro-feminist),指的是那些肯定、同情、理解女性的男性学者。尽管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并未彻底改变,但笔者认为并不能因为歧视女性的现象的存在,就完全否定男性对女性的诚意,的确有这样一部分男性支持女性,肯定女性主义。所以“拥女主义者”用来指称这部分男性学者也许更为贴切。

女性的解放是关乎全人类的事,男性为女性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但不同于女性的贡献,排斥人类另一半的做法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同时,要使女性主义理论真正被理解、被接受,忽视另一半也绝不可能做到。其实男性从事女性主义批评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都是自然而然的。反对男性进入女性主义领域,如同反对女性进入文学领域一样,缺乏合理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男性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进行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可以修正原有的偏狭,获得一种更合理的阅读方式,达到一种互为补充的阐释。这是女性主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体现。众多的男性批评家的加入,促使女性主义批评力量更加强大,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本身则更加完善。同时,他们的参与也表明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具有吸引不带性别偏见的男性批评家的特质。从这个角度看,男性进入女性主义领域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可以这么认为,女性主义者把男性视为敌人的言论毫无意义。女性主义的深入发展,要求女性主义不妨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更多地吸收男性批评家的参与,更多地进行男女互读。当然,男性也应该意识到,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他们和女性的研究是互补的,他们无法取代女性。

(责任编辑 张 灵)

[35] Sandra Harding,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6.

[36] 桑德拉·哈丁于2011年2月14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办公室接受笔者的访谈时同样认同这个观点,她认为男性女性主义者很多,他们的研究横跨了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

competitiveness, China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the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are the key factor in the compet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frequent measures to curb the exchange of talents on the grounds of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using multiple legal means for investigation, and constantly generalizing the standards of judicial judgment. The representative cases involve the high status of personnel and the wide range of influence, which are unprecedented. The practice and mode of law selection, application and enforcement in recent case judgments are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which will help us correctly judge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timely and reasonably adjust the mo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nd bring China's overseas talent introduction system into a more legal, transpar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ck.

Characterization of "Paid Request and Entrustment" in Private Law and Its Judicial Regulation 162

CHEN Guanghui/Doctorate candidate of law, School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Paid request and entrustment" is a type of dispute that often ari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while the adjudication criteria for cause of action, the judgement of validity and refund vary from court to court. In this article, it proposes to regulate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the practice of request and entrustment by commission agreement, based on which its validity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ules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 of the Civil Code. A request is null and void if it violates the imperative provisions of any law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on validi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which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judge. Meanwhile, the judge shall have discretion to apply the rule of "public order and good morals". As for invalid requests, the practice of "return of the principal of the request fee and no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such as interest" shall be established instead of "no return for payment of unlawful cause", so as to achieve a negative assessment of the unlawfulness of both parties' practices.

The Adjustment of Chinese Gratefulness Culture 174

YANG Chunshi/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ion Design Academy.

Abstract: The core of Chinese culture refers to gratefulness with the character of limited reason. Gratefulness culture constructs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hip with showing and requiting favors as its basic ethical principle. For gratefulness culture bearing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s well as flaw and inner contradiction, gratefulness culture has commenced self-adjustment. These cultural adjustmen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setting principle as resolute accordance of gratefulness with a view to its practicality; establishing the principle of controlling emotion via reas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reason; raising the principle of golden mean and loyalty and forbearance in view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wo par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proposing the principle of valuing justice and minimizing material profit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gratefulness and kindness in gratefulness; and constructing the latitude of ideality of benevolence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gratefulness. To a certain extent, adjustment of gratefulness culture has overcome the deficiency of limited reason, but cannot eliminate the inherent flaws in it. To tackle the flaws completely, modern transformation is the only solution.

Reinterpretation on Mal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185

WU Fang/Doctor of art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feminism, there is always a paradox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at only women are qualified and engaging in feminist research. This view is strange and strategically unreasonable. In fact, male scholars like John Mill, Georg Simme, Pierre Bourdieu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and promoted feminism. Thus androgyny perspective is a reasonable way to develop feminism.

New Literati Mo Yan and the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Early 1980s 195

LI Yanwen/Doctor of literature, professor, supervisor of master candidat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80s, Mo Yan was a new literati. He accepted the summon of the literary mainstream voluntarily. While studying to create through imitation, he showed mixed literary tastes. He revealed narrative tone sporadically including fantasy, first-person narrator, animal rhetoric and magnificent language. The benign literary ecology of the literary circles consisting of periodical editors, celebrity reviews, and literary reprints in the early 1980s,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Mo Yan from a new literati to a young writer.